

《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的新修辞研究

何雅棋，涂家金

福建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DOI:10.61369/HASS.2025060005

摘 要：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对该经典文言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文学地位提升意义重大。翻译本质上也是顺应修辞情势，通过适切的修辞或翻译策略，克服各种修辞限制，适应目标受众并赢得其认同的修辞行动。基于新修辞学理论，探讨翟译《聊斋志异》如何因应彼时翻译与传播情境、克服翻译限制、顺应受众，有助于从新视角深化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解，助力我国新时代国际传播建设。

关 键 词： 新修辞；修辞情势；翻译；翟理斯；《聊斋志异》；国际传播

Rhetoric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iles'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He Yaqi, Tu Jiajin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118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y the famous British sinologist Gile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preading and canonization of this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ion in essence is a rhetorical action that uses various discourse means and appropriate rhetoric 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overcome various constraints and adapt to the target audience and win their adherence. Based on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Giles overcame the constraints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in response to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of translation at that time, and how he adapted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appropriate rhetorical/translation strategies. It is hope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a new rhetorical perspective, and shed some light on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translation-bas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Keywords： new Rhetoric; rhetorical situation; translation;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引言

清朝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被称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 翻译的《聊斋志异》对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经典化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聊斋》英译中的副文本 (如王树槐 & 韦雅琪, 2022)、中国形象建构 (如周若雯 & 周德波, 2023)、民俗事象翻译策略 (如蒲艳春, 2023) 等微观、静态的翻译技巧问题, 而对修辞情境、受众顺应、社会制约等宏观因素对翻译选择的影响所涉不多。修辞是通知适切话语手段对目标受众进行说服并赢得其认同的话语实践。如《聊斋》这样中国经典文学文化作品的英译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双语转换赢得国际受众认同的修辞和国际传播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本文拟从新修辞学之修辞情势理论视角, 探讨《聊斋》翟译本的翻译修辞策略, 以期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有所启示。修辞情势理论关注修辞话语生产的情境, 聚焦话语传播所面临的缺失、目标受众和一系列修辞制约因素。以其为理论视角, 有助于从修辞视角和宏微观层面解析翟译《聊斋》在国际传播中的得失, 进而深化对翻译修辞实践和翻译国际传播的认识。

项目信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19YJA740051)。

作者简介：

何雅棋 (2000-), 女, 福建漳浦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修辞学、英语笔译;

涂家金 (1973-), 男, 福建闽清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西方修辞学、翻译修辞学。

一、翻译的修辞情势

(一) 翻译与修辞

当代修辞学关注如何通过话语手段影响他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促进合作(刘亚猛,2004)。翻译本质上也是运用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话语手段,通过适切的修辞或翻译策略,克服各种修辞限制,适应目标受众并赢得其认同的修辞行动和传播实践。Carlos(2009:336-7)认为,译者如同面对敌意观众的演说者,要吸引对原文本不感兴趣的读者,需依据特定修辞情境做出语言选择,且每次翻译“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吸引读者的价值观,因为翻译者作为文化使节,不仅受限于自身将一种文化传递到另一种文化的能力,还受限于他找到与听众共同点的沟通能力,以及说服他们阅读翻译文本的行为本身是有价值的”。刘亚猛(2014)也指出,修辞是翻译思想的观念母体,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修辞实践。这表明翻译实质是修辞的一种形式。

(二) 翻译修辞情势

修辞情势是指“由一系列人物、事件、物体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组合所呈现出的一种实际存在或潜在的缺失;若能顺应形势,运用相应的修辞话语来影响人们的选择或行为,从而显著改变这种缺失,那么该缺失就能得到完全或部分的消除。”(Bitzer,1968:6)。修辞情势包括三个基本要素:①缺失(exigence),指“当前存在的一种迫切需要,一种亟待补救的缺憾、一个亟待克服的障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亟待更正的偏离常规之举”。缺失必须具有通过修辞话语得以改善的可能性,同时也需要借助语言手段而非其他方式来解决。②受众,其具有双重性和能动性:作为修辞话语的接受者,他们既可能受到话语内容的感召与影响,又具备通过实际行动改变现状的能力。③一系列修辞局限及制约因素,涵盖影响修辞行为的所有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通过限制决策和行为选择的方式,对修辞活动的开展产生实质性影响。陈小慰(2022:7)指出,翻译修辞情势的核心特征是动态性,这一特性源于翻译修辞行为本身的动态性。由于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译文的选择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趋势。

二、《聊斋》英译的修辞情势与翻译顺应

从修辞情境视角看,翟理斯译《聊斋》正是顺应彼时的情势与受众期待,引导受众认同其译文的修辞行动和传播实践。

(一) 受众

受众作为修辞话语的能动接收者,在微观层面是拥有历史、地理与文化经验的个体,在宏观层面是拥有情感共鸣与趋同的群体(吴赟&孙萌,2023)。1880年翟理斯《聊斋》选译本的受众是英语国家的知识阶层,旨在满足彼时英国理解中国经典或传统文化、认识中国社会,以便服务其对华商贸乃至殖民等方面的急需之修辞情势。韩雨(2021)指出,中英因外交、商业等目的交

流渐密,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大规模涌入中国内陆,推动了英国汉学发展,也使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催生了翻译热潮。

例1

原文: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

译文:Then, suddenly he felt himself floating in the air, as if riding on a cloud and found himself passing through the wall.

翟理斯对划线处添加脚注“Which will doubtless remind the reader of ‘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she saw there.’”,表明套译了同时期英国畅销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主角步入镜中世界的场景描述。爱丽丝系列被称为是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重要柱石(钟雅璇,2013:86)。翟此处未直译“到壁上”,而是巧妙套用了英国作家道奇森的表述 pass through the wall(穿过壁),这意味着他试图借用彼时西方读者对《爱丽丝》系列已有的认知和喜好,引导读者将朱孝廉的经历与爱丽丝的奇遇联想,实现文化移植。这一考虑反映了他重视目标受众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有效运用受众熟悉的文学资源,且揭示了中英文学在奇幻设定的共通之处,从而达到译文为受众接受这一目的,实现由“分”到“合”的修辞认同效果。

(二) 缺失

修辞缺失在翻译实践中可分为宏观缺失和微观缺失。前者指翻译的社会文化动因,如翟理斯译《聊斋》时英国对中华文化的需求、成因及未满足状况,从而催生了翻译诸如《聊斋》这样的中华文化经典的迫切需要和紧急事态等。后者则聚焦于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如语言、文化、修辞说理、逻辑及认同层面的缺失。

在宏观上,19世纪末欧美盛行对东方的神秘想象,翟译《聊斋》既满足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异域风情”的好奇,又力求突破当时流行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他希望借此为西方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在中西文化交流尚不频繁之时增进西方对中国的认知。

微观上,《聊斋》中存在许多中国古代特有词汇,如孝廉、垂髫、挂褡、曹等,它们在英文中难有直接对应。彼时的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深入,缺乏背景知识及实践经验,若进行字面翻译,将使信息传递有效性大打折扣,甚至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修辞合作意愿)。

例2

原文:遂命主人割豚肋,堆以蒸饼。

译文:Then he told the landlord to bring a shoulder of pork and a quantity of boiled dumplings.

“蒸饼”最早载于《晋书·何曾传》,是一种蒸制而成的饼状面食,形制与功用类似现今馒头。该词清晰呈现出微观层面的修辞缺失:翟理斯认为英语里没有与“蒸饼”精准对应的词,且19世纪中国美食未被西方读者熟知,修辞者面临词汇匮乏问题。

翟选取“dumplings”作为译文，精准把握了当时西方受众将饺子视为中国标志性食物典型代表的认知特点。作为修辞者，他采用模糊化修辞策略，大意上忠实了原文中的面食概念，这一操作既解决了语言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文化缺失，使目标受众能更好理解和接受原文概念。

（三）修辞局限与翻译的修辞顺应

修辞局限也可分为宏观局限与微观局限两类。宏观局限指译者所面对的政治、社会、文化及赞助人（如出版商、资金）等对翻译施加的外在限制；微观局限指翻译实践本身所要克服的各种限制，如词汇、句法、语篇层面的各种制约。

宏观上，翟理斯热爱中国文化，译《聊斋》时既关注故事内容与原文语言特色，又重视译文传播效果，体现了他作为译者的严谨态度和对中华文化的尊重。

例3

原文：①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②狎好。

译文：Then they fell on their knees and worshiped heaven and earth together, and rose up as man and wife.

划线处分别意为①亲近、亲热②发生性关系。18世纪的英法主流规范严格禁止在舞台上呈现低俗、有伤风化的情节，因此译者往往充当内容审查者，对原文不当之处进行编辑和剔除；同时，书店、出版社或印刷商也排斥可能损害声誉的文本，如“1875年英国印刷商拒绝出版理查德·伯顿等翻译的古印度性爱经典《爱经》”（转引自靳振勇,2022:104），由此可窥见社会大环境下译者与出版商面临的风险。

为克服这一外在局限，翟对原文已趋于隐晦的性描述“遽拥之亦不甚拒”进行删减，还将性相关情节精心修改为“拜了天地，结为连理”，并且严肃地添加注释阐释中国传统婚礼的风俗，以便更好地向读者展示中华文化的核心；至于后续更露骨的情节，则进行了彻底删除。此外，翟在文本选择上也进行了修辞操作，以应对上述的宏观局限。靳振勇通过将翟译本与其他译本，尤其是闵福德译本进行对比，发现翟在文本选择时故意避免了涉及爱欲的叙事篇目（2022:100）。通过这些策略，翟不仅确保了译作能够被当时的社会接受，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文的文化内涵。

微观上，修辞的局限主要体现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直接影响译文的表观力和艺术性。词汇方面，文化差异导致原文的联想、象征意义在译文中缺失，译者需借助修辞或顺应策略来弥补。语篇方面，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及有效表达是修辞能否奏效的关键。翻译本质是文化与意义的传递，活用修辞能提升译文的连贯性和整体感。

例4

原文：见一人颀然而长，筋骨隆起，彷徨坐侧，色黯淡有戚容。

译文：He saw a great big fellow walk in and seat himself at

no great distance in a very melancholy mood.

划线处含两层语义：人坐旁边；表情黯淡、情绪低落。“彷徨”“色黯淡”和“戚容”在语义上重复，若按照字面直译，则会使英文表达拖沓，令目标读者费解。而翟仅运用三个短语就理清了其中的逻辑关系，表达为“seat himself /at no great distance / in a very melancholy mood”，简洁地表达了位置与情绪，避免拖沓，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为后续修辞打下了基础。同时，多使用介词划分意群，也克服了汉语意合带来的逻辑不清问题。通过上述修辞操作，翟有效提升了译文的逻辑性和可读性。

修辞者需要在动态中不断把握一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涉及广泛的修辞语境因素加以关注，才能最大程度上制约或弥补缺失，引导受众预期行为和态度的发生。因此，译者在翻译中不仅要忠实于原文，更要考虑到目标语言和文化环境，确保翻译的修辞效果。

三、启示

（一）翟译《聊斋》是顺应修辞情势的翻译修辞实践

翟译本的翻译策略选择体现了对其所面对的修辞情势的顺应和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动态制衡与互动关系。这使得其能够成功地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实现其翻译目的。翟理斯通过选词、造句、语篇归化策略，使译文结构风格符合英语作品习惯，使译文贴近英语受众。他还通过篇章筛选、情节改写或删减，尽可能地满足受众阅读需求，提升受众对译文乃至译入语文化的认同。

当然，侧重运用归化策略也导致有时忽略了微观层面的字、词文化意义的完整、准确传达，由此不可避免地丢失了部分中华特色传统文化因子的传播。翻译因此作为一种修辞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选择、变通和妥协。

（二）翻译是一种展示修辞

从新修辞视角看，翟译《聊斋》也可以理解为 Perelman(1982:19)所说的“展示修辞”。展示修辞是利用庆典等场合重申或强调特定文化的流价值观、信念等的话语实践。其虽表面上无关直接利害关系，但其实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修辞实践，因其所重申、强调的价值观等恰恰为其他类型修辞实践提供了说服受众所必不可少的话语基础（同上：19-20）。翟译之所以可视为是展示修辞实践，主要体现在：一是为后来乃至当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利用的“平行文本和语料”；二是与其他相关翻译或文本共同在英语世界培植了中华文化知识土壤，为后续传播跨文化传播奠定了知识、文化和观念基础；三是其广泛传播培养了一批欣赏吸纳中华文化的国际受众，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奠定了关键的接受基础，培育了重要的修辞受众群体。

四、结语

本研究不仅为《聊斋》英译提供了新的解读，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启示。翟理斯的翻译实践所展现的对修辞情势的敏锐顺应、对翻译局限的深刻理解与克服等卓越修辞意识，以及其作为展示修辞在英语世界奠定的知识、文化、受众等多方面

基础，对新时代的翻译与国际传播实践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主动作为，充分重视如翟理斯这样的当代学界文化界人士的桥梁作用。同时，由于当前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翟理斯时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译文是否仍完全适应当下的国际修辞情势值得我们深思，这凸显了重译经典作品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 [1] 王树槐, 韦雅琪. 闵福德译《聊斋志异》副文本: 功能、成因及启示 [J]. 外语研究, 2022(1): 85-90+111.
- [2] 周若雯, 周德波. 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的中国形象建构 [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6): 106-113.
- [3] 蒲艳春. 《聊斋志异》民俗事象英译策略研究及对民俗交流的启示 [J]. 蒲松龄研究, 2023(4): 49-58.
- [4] 刘亚猛. 追求象征的力量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62.
- [5] Claudia, C. Translation as Rhetoric: Edward Jerningham's "Impenitence" (1800) [J]. *Rhetoric Review*, 2009, 28, 4: 335-351.
- [6] 刘亚猛. 修辞是翻译思想的观念母体 [J]. 当代修辞学, 2014(3): 1-7.
- [7] Bitzer, L.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J].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968(1): 1-14.
- [8] 陈小慰. 论翻译的“修辞语境”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8): 61-72.
- [9] 吴赞, 孙萌. 对外翻译中的受众概念与行为机制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23(8): 61-72.
- [10] 韩雨.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汉学教席沿革研究 (1847-1917) [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11] 靳振勇. 批评之批评: 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之“去秽褻”的再思考 [J]. 外国语, 2022(4): 99-107.
- [12] Perelman, C. *The Realm of Rhetoric*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2: 19.